

關注「超齡子女」來港後的困難——希望與挑戰

陳義飛 新家園協會執行幹事

我們再次呼籲特區政府不單單只做一件促使港人家庭團聚的好事，還要認真關注新來港人士的適應困難與需要，投入資源，令新來港人士適應和發展，對香港未來的穩定與發展是一種保障。

中央政府有關主管部門經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協商後，決定由2011年4月1日起，香港居民在內地「超齡子女」，可申請單程證來港定居，與親生父母團聚。

「新家園協會」作為一個專為新來港人士和準來港人士提供跨地域一站式專業社工服務的註冊慈善團體，自然對中央及香港特區政府上述體察民情、紓民解困的措施表示大力的支持，並將會在協會的服務方面全力配合，盡力協助新來港人士的家庭早日融入香港的生活，積極投入香港的建設。

體察民情好政策

作為一種政策，規定的適用人士應當清晰無歧義的，但當比較內地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的相關文件及香港特區政府的新聞公布，發現他們所描述的適用對象，即「超齡子女」的定義有歧義。根據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的文件，香港居民在內地超齡子女，是指「在其親生父親或母親於2001年11月1日以前取得香港居民身份證時未滿14周歲的在內地子女。」顯而易見，根據公安部的規定，只要適用以下兩項條件的人士就符合申請單程證來港定居的資格：1.父或母在2001年11月1日前已取得香港居民身份證；2.內地子女在父或母取得香港居民身份證時未滿14周歲。但根據香港特區政府於2011年1月14日的新聞公布，「超齡子女」就是指「這類在等候審批過程中超過14周歲的子女，即2001年11月1日前其親生父親或母親取得香港居民身份證時未滿14周歲的人士。」香港政府的公布，除了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所述的二點外，還加上「在等候審批過程中」的規定。即是該香港人的子女除了要滿足第1和第2點外，還要加上曾經申請單程證的條件，才納入「超齡子女」的範圍。跟公安部規定的相比，香港特區政府對「超齡子女」的定義明顯是收窄了適用的範圍。

香港特區政府與中央有關主管部門經多次協商而後有今次港人在內地「超齡子女」可單程到港定居的政策，很難令人相信是香港特區政府對適用對象的理解出現問題，會不會是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對適用對象只是作出原則的規定，實行起來有類似香港特區政府的附加條件？如果對適用對象的規定有差異，肯定造成混亂，引起不滿。所以，香港特區政府應與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統一有關的規定，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誤會和混亂。

至於受惠「超齡子女」的人數，特區政府的估計是數以萬計；而有團體、傳媒或學者的估計一般是介乎2萬到5萬之間，言人殊。不過，由於影響符合申請資格的因素太多，很難有一個很具體的人數估計。不過，應不是每一個受惠的「超齡子女」，都會提出單程證的申請。根據2001年11月1日前滿14周歲的情況推算，受惠的「超齡子女」的年紀應是24歲以上的成年人，他



■保安局局長宣布港人內地「超齡子女」申請單程證到港定居安排。

們不少都已經在內地成家立業，近年內地的經濟發展情況好，要他們離鄉別井到香港定居，要考慮的因素會很多，所以最後決定申請到港定居的「超齡子女」應會少於合乎申請資格的人數。但是，我們還要留意到已申請到港定居的「超齡子女」的配偶和他們的子女其後都可以按家庭團聚的資格申請到港，這樣，最後因此政策而到港定居人數應會倍增。

觀乎香港社會對「超齡子女」定居安排的反應，樂觀者有之，悲觀者有之。一些樂觀者相信有關政策對香港整體社會有利。他們解釋，香港人口老化問題趨趨嚴重，而「超齡子女」則以中年人為主，相信可以成為香港的「生力軍」，同時為人口結構帶來平衡作用。另外一些則認為由於香港經濟暢旺，失業人數減少，相信可吸納這些「超齡子女」。悲觀者則認為這批「超齡子女」到港後肯定會成為香港社會的沉重負擔，甚至依賴綜援生活，淘盡香港。

過度樂觀和悲觀的觀點都無助解決問題。我們應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分析問題、面對挑戰和尋求解決的方法。首先，這批「超齡子女」都是成年人，大多都應已經就業，他們到港後就要面對就業、居住等問題。他們的學歷水平、技能能否適用香港社會就成為很大的重點，因為香港已經慢慢轉型成為高知識高技術和服務型的經濟體系，現今，年青、勤力等香港當年賴以成功的因素當然可以讓人養活自己，但要有充裕的收入和較好的生活，還要有高知識高技術等才能。

其實，自香港特區回歸祖國後，就確立了香港永久居民的子女擁有居港權的政策，當時就有一大批成年「居港權子女」陸續到港定居。今次只是一些當年沒有居港權的港人內地「超齡子女」獲得到港定居的機會而已。「居港權」成年子女和「超齡子女」應有一定的可比性。根據民政事務總署及入境事務處內地新來港定居人士的統計數字（2009年第一季），曾接受中學教育的新來港人士由2004年的75.0%減少至2009年第一季的73.9%，同期曾接受大專或以上教育的比例則由10.5%增至14.6%；在2009年第一季曾在內地工作

的新來港人士，18.8%曾在內地從事文員及售貨員的工作，另外13.5%則是農民、獵人及漁民；表示適應香港生活有困難的新來港人士自2004年開始，均維持在68%或以上。他們面對的最大困難是工作（54.0%），其次是居住環境（31.8%）。如果新一批到港居住的「超齡子女」的自身背景情況跟上述的新來港人士差不多，他們到港後的生活、工作和居住的適應就不容樂觀。

另外，新家園協會通過整理民政事務總署2000年至2009年內地新來港定居人士的統計數字，發現新來港參與勞動人士的家庭每月收入低於8,999港元的，十年來每年都維持在70%（詳細數字請參考附件一），而十年中全港家庭每月收入都在17,250港元至18,705港元之間。根據國際貧困標準：貧困線定於社會平均收入或社會中位收入的一半。即是顯示這十年來，每年都有近七成的新來港勞動人士及其家庭生活生活在貧窮之中。在香港這個現代化的都會，這是一個人非常遺憾和痛心的數字。新來港人士無法通過勞動擺脫貧困、改善生活，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如果處理不善，容易造成家庭問題和隔代貧窮。

投入資源協助適應新生活

新政策能促使港人家庭團聚是好事，而這批以中年人為主的「超齡子女」，也可能成為香港的「生力軍」，但不難理解對香港或他們來說也是一種很大的挑戰。一般來說，能在接受教育階段時便來港，將更易適應香港生活，如年紀漸大才來港，可能在資歷、技能及職業取向方面難以重新適應。

我們認為，香港特區政府應該提供資源為這批「超齡子女」提供跨地域的社會服務，包括內地服務及到港後的服務。內地服務為他們在提出申請前作出諮詢及提供香港生活資訊等資料，以令他們有足夠的香港生活資訊作出考慮和選擇，並作期望調整。經過細心謹慎考慮後才抉擇是必須的。具體的服務包括在內地或香港舉行諮詢會、設立諮詢熱線和在內地派發香港生活資訊手冊等。到港後，有關的服務團體需因應他們的需要，除了提供社會適應技巧、學習廣東話繁體字及職業技能等培訓課程外，也有各類家庭功能提升服務，例如家庭生活教育、個人輔導等，還有社區融入服務，例如社區導引、義工訓練等，讓這批新來港人士盡快適應和融入香港生活；另外，我們建議當局應撥增資源，尤其是增加撥員再培訓的學額及放寬公屋申請資格等，以協助他們就業和居住。

在此，我們再次呼籲特區政府不單單只做一件促使港人家庭團聚的好事，還要認真關注新來港人士的適應困難與需要，投入資源，令新來港人士適應和發展，對香港未來的穩定與發展是一種保障。

然後使用彈道導彈高速度攻擊。胡錦濤見了美國的國防部長，還證實了中國試驗第五代戰機，作戰半徑超過一千公里，讓美國的航空母艦無法靠近中國海岸一千公里範圍。接着，胡錦濤底氣十足，向美國的傳媒宣布，美元主導國際貨幣已經過時了，美濫發貨幣損害其他國家，應進行國際協商。即是說，美國還憑什麼可以主宰人民幣的命運？這是剛柔並濟，絕不妥協。和則兩利，鬥則兩損。美國人看着辦吧。

中國已經不是滿清時代，炮艦進入黃海的政策，不能嚇唬中國。亂印鈔票，國際要管。奧巴馬還要競選下一任美國總統，在經濟合作、世界熱點問題上，還需要中國的幫助。這正是美國的弱點所在。胡錦濤這次出訪美國，胸有成竹。香港的親美派，看到中國的國家實力，也明白他們的局限在哪裡了。挾美自重，大搞「民運」，挑戰中華民族的核心利益這一套，還是收起來吧。

大國角力 胡錦濤底氣足

蕭何

應美國總統奧巴馬邀請，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18日抵達美國首都華盛頓，展開對美國的第4日國事訪問。但在胡錦濤訪問美國前夕，美國來勢洶洶，大拋浪頭，企圖用軍事威脅震懾中國，讓中國屈服在其強權之下。

美國的航空母艦駛進了黃海，美國的飛機升上天空，四百里就可以用導彈攻擊中國的首都。美國拼湊美日韓的軍事聯盟，也是為了封鎖中國的海軍。軍事演習作用非常明顯，第一意圖就是展示出匕首，要指向中國的喉嚨，讓中國屈服。第二，就是迫使中國和美國進行軍備競賽，消耗中國的國力，用當年對付蘇聯的辦法對付中國。

舞刀弄槍之後，美國連發三招：第一招，美國財政部長發炮，強迫人民幣升值。第二招，美國商務部長發炮，顛倒是非，攻擊中國實行保護主義，要求中國開放市場。第三招，美國傳媒預先公布，美國將實行第二輪對台灣的軍售。

大國互相角力，中國絕對不會示弱。中國的民間網站，透露了中國打擊美國航空母艦的各種導彈和策略。中國財力不虛，不會跌入軍備競賽陷阱，可以錯位競爭，破解美國的反導彈武器，也是以低廉成本對付美國的幾百萬元一支的愛國者導彈，穩操勝券。主要就是利用密集的普通火箭先行出擊，消耗美國的昂貴反導彈武器，

井水不犯河水 要視乎如何表述

吳歷山

在眾多有關「井水不犯河水」的評論中，大家似乎忽略了王光亞先生提到的「要看如何表述」這幾個字，這是衡量是否遵守「井水不犯河水」的重要標準。事實上，自從九七回歸以來，內地與港澳之間發生過一連串問題和事件，社會上出現不同形式的表達方式，大家不妨認真檢討一下，究竟哪些是違反了「一國兩制」、「司法獨立」、「井水不犯河水」的原則了。

新上任不久的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在北京會見香港教師後接受香港記者採訪時，針對趙連海案件的講話，在香港引起廣泛的關注，這也是意料中事。一來趙案經過幾個月的炒作，已然掀起了軒然大波，但在關鍵時刻又喜劇性地突然平靜收場，令好些人大感疑惑；二來這是上任僅兩個多月的內地高官一反前低的低調作風，首次面對境外記者回答敏感問題，自然引來香港社會和各大報章紛紛評論解讀。有的說王光亞是專指港區人大代表聯署一事，認為王光亞是在勸戒甚至警告；也有認為北京是企圖遏制港人對中央施政的各種批評；更有甚者將「井水不犯河水」攪渾，說內地不願受犯顏直諫，當出現不利內地言論時，香港被視為境外的一部分。上述評論顯然沒有事實根據。

不應該干預內地司法

從電視新聞鏡頭所見，王光亞30多年的外交經驗沒有白搭，他氣定神閒，短短一席話已一針見血地闡述了「內地司法獨立」、「一國兩制」、「井水不犯河水」是處理港澳與內地問題的基本原則。一直陪伴在側的全國人大常委范麗蓉翻看影帶後一再聲明，王光亞有關言論，不是針對趙連海的案件，和港區全國人大求職完全無關，「我記得記者朋友不斷問他覺不覺得香港的人大代表會干預司法獨立，干擾司法，王主任說任何人，任何政府部門都不可以干預司法」。作為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在接受傳媒採訪之機，全面闡述內地與港澳的處事原則是極其平常也極其必要的。

正如王光亞所說：「在絕大部分國家司法都是獨立的，內地也一樣，別的方面不應該干預內地司法。」其實「司法獨立」一直以來就是民主社會和法制社會的根本元素和基礎。凡是有普通法律常識的人都知道，世界各地，因其社會制度、宗教信仰、人文理念的不同，根據當地實際情況制訂自己的法律和司法準則，外人不應將自己的看法和判斷強加干涉，如信仰伊斯蘭教國家的女人出街必須蒙面，犯私通罪要判處死刑；新加坡至今仍執行鞭笞刑罰；台灣法律保留妨礙他人家庭罪；即使美英西國家法庭也常有作出離奇古怪的判決，在美國各州有各自的法律，同樣案情在不同州判決可以天淵之別。難道我們看不慣就可以去衝擊對方的領事館等相關機構，或派人去示威抗議，或以各種方式煽動當地人民起來造反嗎？尊重其他地區和國家現有的司法制度不僅是人文的素養，也是民主的基石。港區人大代表聯署求情就是尊重內地司法獨立的行為，就如一個辯護律師為當事人辯護時，必須在尊重現行法律的前提下辯護，一旦當事人被判有罪，他只會為犯人求情，以求減刑，而不會大罵法官或從整體上否定司法制度。

表述方式是判斷井水論的標準

香港市民，在「一國兩制」下，關心內地的發展和事務是應該的，儘管香港與內地的政治制度不同，實行的各項法律法規也有所不同，在很多問題的處理上也必然存在差異，這並不影響港人出於對國家的關懷向內地提出批評和建議，但必須在「一國兩制」原則下尊重內地的司法獨立。

「井水不犯河水」最早出自於1989年江澤民會見安子介一小時的談話，江澤民指出，在處理港澳和台灣問題上，中國一貫採取「一國兩制」的方針，內地搞社會主義，港澳和台灣搞資本主義，雙方互不干涉，「井水不犯河水」。當初提出時得到香港社會的普遍接受和歡迎，它無疑解除了港人擔憂內地社會制度會影響香港的重重顧慮。但事到如今，卻出現了逆轉的趨勢：香港有人不停地違反「井水不犯河水」的原則，提出：要「民主抗共」、「民主輸入內地」，並一再地在言論上、行動上，把矛頭針對內地的執政黨和內地的各項制度，衝擊中聯辦的行動不斷升級，步步進逼……上述種種都是違反了「井水不犯河水」的原則。

不能一再衝擊內地底線

古語云：「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既然希望內地不干預香港特區，卻將行動不斷升級一再衝擊內地底線，設若有一天，內地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試問香港經得起嗎？

筆者留意到，在眾多的評論中，大家似乎忽略了王光亞先生提到的「要看如何表述」這幾個字，這是衡量是否遵守「井水不犯河水」的重要標準。事實上，自從九七回歸以來，內地與港澳之間發生過一連串問題和事件，社會上出現不同形式的表達方式，大家不妨認真檢討一下，究竟哪些是違反了「一國兩制」、「司法獨立」、「井水不犯河水」的原則了。

原載《鏡報》月刊2011年2月號

內地經濟的滯脹之憂

張敬偉

中國進入通脹時代。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認為，這屬於成本推動型通脹，緊縮的宏觀政策對此是無效的。此外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賀賢表示，對今年經濟有滯脹的擔心。

通脹很可怕，但滯脹更可怕。在上世紀70年代的經濟危機中，西方世界經歷過了夢魘般的經濟滯滯與高通貨膨脹並存的景象。一旦滯脹纏身，再強勁的經濟體也會被拖得精疲力盡，陷入持久性的高失業率和不景氣的泥潭中。日本，就是滯脹的典型標本。

後金融危機時候，在全球經濟不見復甦希望的悲情下，中國經濟去年一枝獨秀，讓國人倍感自豪。但是，中國經濟也迎來了通脹時代，而且不是單純的通脹，如厲以寧和賀賢兩位學者所言，屬於成本推動型的通脹。

拋開學術性的經濟學理論，成本推動型通脹在中國的表現是，農產品價格持續攀升，勞動力價格不斷上揚，原材料短缺價格高企，持續宏調難抑房市泡沫，各地土地財政衝動難以遏制。上述產品成本，在通脹的發酵下，還會持續

上升。值得一提的是，由於食品價格在CPI中佔了三成以上比例，公眾對通脹的心理承受力極差。如果考慮到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加快，農村居民大量湧入城市，中國社會的就業壓力會倍增。

物價高企的通脹壓力難除，高失業率的風險陡現，預示着滯脹的幽靈開始覬覦着中國經濟。滯脹風險，來源有二。

宏觀言之是中國30年經濟高速增長的慣性所致。好的方面是使中國綜合實力大幅提升，成為全球第二；不好的方面則是發展帶來了諸多負面效應，如兩極分化，財產分配不均，導致全社會缺乏應對宏觀經濟變化的能力，如市場的高度全球化和開放性與市場法治化和市場主體規則意識缺失的矛盾，如金融體系未能全面開放掩蔽下的潛在風險等。

在金融危機下，中國採取的是政府投資和信貸放量的刺激政策，投入規模較大，雖能在短期內收到抬升經濟增長的效應，但維持經濟永續發展後勁不足。而且在中央寬鬆政策的導向下，地方政府的離子鋪的更大。這些大規模投資，消化不良會有較長的市場滯後效應。

驅散滯脹，是個難題。值得一提的是，中央已經開出了抑制通脹的藥方，即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前者的積極在於保增長、改結構、調收入、促和諧，理論上沒有問題，關鍵是如何踐行。在行政執行的多層級傳導中，很難保障積極的財政政策不會走偏。至於穩健的貨幣政策，其實可以理解為「緊縮」，去年下半年以來，央行已經7次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兩次加息。加上1月20日的這次，大型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將調整到19%，達到歷史最高水平。如此金融政策或僅具象徵意義，並不能解決原材料、農產品、勞動力等成本價格。

在我看來，積極的財政政策應該更多投放到民生層面。中國有豐裕的財政來源，加大醫保、社保投入，有序減稅，扶持創新和促使企業轉型升級，能夠昇華中國社會結構，破解收入分配不公，提高居民收入，減緩通脹壓力。穩健的貨幣政策應縮放有度，對於中小企業、三農和保障房建設加大資金支持力度，以涵養就業機會、培植新的經濟增長點和確保民生安穩；對於商品房、政績工程，則要擰緊信貸龍頭。中國經濟到了轉型期。高通脹、高增長不可持續；低通脹、高增長也不現實；低增長、高通脹（滯脹）必須規避。

凝聚社會共識 取得中央支持

周八駿 資深評論員

香江透視

特區政府為申辦2023年亞運會所做的努力，因為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否決了特區政府的有關撥款而受挫。香港所能夠爭取的是2027年亞運會了。對於距今數年以後的事，本屆特區政府主要官員和立法會議員也許只有一些人屆時能夠參與決定。然而，香港眼下亟需修補愈益深化的社會裂痕，則是本屆特區政府主要官員不可推諉的責任，也是對本屆立法會議員是否對香港負責的嚴峻考驗。

3個月前，立法會否決了行政長官關於剔出清水灣郊野公園5公頃土地撥入將軍澳堆填區的指令。在那一事件中，香港所有的政治團體都站到了特區政府的對立面。而這一回，特區政府的政策意向又一次遭受香港政治團體的反對。

2002年7月1日特區第二屆政府開始推行主要官員問責制至2010年10月13日立法會否決行政長官關於剔出清水灣郊野公園5公頃土地撥入將軍澳堆填區的指令，大體上，行政長官及其管治團隊能夠取得立法會中愛國愛港政治團體的支持而維持有效管治。

2010年6月，民主黨「臨時妥協」，使2012年政改方案得以在立法會通過，是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之間關係的又一個插曲，固然預示香港反對派將會出現分化和分裂。但是，嗣後，民主黨在一系列政治問題上的表現，

說明其對抗中央的立場未變；支持本屆政府的可能性，則因為該政治團體必須以爭取選票為優先而接近於零。

香港社會對待申辦2023年亞運會的民意調查，逐步趨向於反對者佔明顯上風，折射香港社會焦點關注當前經濟和民生問題，也反映許多香港居民對特區政府的管治和施政失望。正如一些評論所指出，申辦亞運會原本應當是全民支持的大好事，在其他國家或地區區之推恐不及。香港社會竟然有如此大的消極聲音，實屬罕見。

香港社會必須凝聚共識。特區政府必須為香港解決當前問題和謀求長遠發展提供清晰的指引。缺乏方向和目標，何來社會共識？方向和目標不能是空泛的言論，而是腳踏實地可以實現的藍圖。

必須指出，有人利用民主黨一位元老的逝世大作反對國家執政黨的文章。的確，香港社會主流民意和相應的政治生態依舊有利於反對派。但是，誰如果指望煽動香港社會反對國家執政黨的情緒來擴張自己的政治力量，那麼，必定事與願違。

香港社會固然有不少人對國家執政黨抱有戒心或敵意，但是，面對香港經濟和民生的深層次問題沒有哪一個是可以離開中央的支持而得到解決，他（她）們中越來越多人不可能支持反對國家執政黨的政治取向。

試問香港今日政局之錯綜複雜，離開中央的支持，焉能穩定大局？